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卷

1849年8月—1851年6月

著 作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35)

责任编辑: 邓仁娥
装帧设计: 尹凤阁 王师颉
版式设计: 程凤琴
责任校对: 唐桂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
ISBN 7-01-002423-5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 - 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55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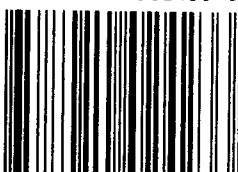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十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ISBN 7-01-002423-5



9 787010 024233 >

人 大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3 月第 2 版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1 插页 13

字数: 711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7-01-002423-5/A·225 定价: 55.00 元

凡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9 年 8 月中旬到 1851 年 6 月底所写的政治论著、党内文件、时政评论、通讯报道、图书评介等著述。

在这段时间里，欧洲大陆各国的 1848—1849 年革命接连失败，欧洲革命开始转入低潮，而资本主义经历了重大危机以后，开始出现转机，并且很快就走向繁荣。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9 年下半年先后流亡到了伦敦，这时，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新形势下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加强党的工作，尽可能快地对 1848—1849 年革命从理论上作出全面的总结。为此，除了日常工作如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和救济革命流亡者以外，最迫切的事情是要创办一家能继续《新莱茵报》事业的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报刊。经过多方努力，《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一期于 1850 年 1 月份正式出版。这是第一家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的杂志。本卷的大部分文章，都取自该杂志。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连载的马克思写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大发展和实际运用。恩格斯在 1895 年为重新出版该书而写的导言中指出，这“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时期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见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出色地联系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实际，充分阐发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原理，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各阶级、各党派和各种思想之间的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以及各种不同的政体的作用；革命在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等等。

马克思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说明了革命如何加速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如何在革命的进程中迅速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积极行动起来，直接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他形象地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见本卷第214页）这一概括革命运动巨大历史作用的名言。革命胜利前进是这样，革命遭到失败也是这样，也同样能提高群众的认识，为他们的下一次革命准备更多的实际经验和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法国1848年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提出“**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见本卷第157页）经过革命失败的血的洗礼，法国无产阶级将抛弃各种色彩的所谓社会主义而日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马克思在给这种革命社会主义即科学共产主义下定义时，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意义重大的概念，并且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理论方面的任务。他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见本卷第220页）

法国六月起义后改组了的议会在制定共和国宪法时，删去了二月革命后通过的宪法草案中的“劳动权”，代之以“享受社会救济权”。马克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出了无产阶级概括自己经济改造要求的简明的公式。他认为，“劳动权”只是“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165—166页）。恩格斯在1895年高度评价了这个想法，他认为，马克思是“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 可见，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见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对法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政治态度逐一作了剖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并且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他用很大的篇幅来分析农民的状况，回顾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农民处境恶化的过程，他指出，法国农民遭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他们的剥削者实际上都是资本。“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见本卷第214页）根据对法国革命中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马克思得出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极为重要的结论：无

产阶级在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

恩格斯在《革命的两年》一文中，向英国工人阶级介绍了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的内容，而且直接摘引了其中许多十分重要的段落。

本卷所收入的一些著作，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对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经验所作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写的 1850 年 3 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等都是这样的著作。

在 3 月的《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指出，《共产党宣言》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原理，在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进程中都得到了证实。他们在《告同盟书》中提出的对同盟进行改组的计划，是同盟改组的理论基础。3 月的《告同盟书》总结的主要一点，就是必须建立和保持秘密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组织，因为革命失败后，在德国已经完全没有了言论自由。工人政党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策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抗衡，即使在同其他民主派政党合作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做；如果起义胜利，无产阶级就应该保持独立的武装，而不应当把武器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必要时都应予以回击，甚至武力回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德国的状况，认为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领导人民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工人阶级就必须独立地、不间断地将革命进行下去。关于不断革命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848—1849 年发表于《新莱茵报》上的许多文章中都已经说到了，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 3 月的《告同盟书》中，则对不断革命论作了经典性的最完整的表述。他们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实现了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

革后，就希望尽快结束革命，相反地，“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389页）

本卷中另一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是6月份写的，这篇《告同盟书》同3月的那篇一样，指出“德国全国各地都需要建立强大的秘密的革命政党的组织”，也明确指出了工人政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工人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派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于其他任何政党。”（见本卷第424、426页）6月的《告同盟书》还通报了同盟在国内外的活动情况以及各地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团体活动的情况。

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是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总结的一部分，也是他以亲身参加者和目击者身分写出的生动翔实的报道。恩格斯认为，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最后阶段中为维护帝国宪法而举行的武装起义，最突出地表现了典型的德国特色。起义的起因、它的发生、它的方向、它的整个进程都是纯德国式的，它反映了德国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程度。整个著作生动地刻画出，取得领导权的小资产阶级如何随着革命的步步深入逐渐从口头革命转变成背叛革命。他用这次武装起义的大量事实证明，德国的小资产者在当时、在以后永远都不能领导革命。只有工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者才能将革命进行下去。“最坚定的共产主义

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见本卷第 94 页)

恩格斯写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本卷收入的又一长篇著作。在这里，恩格斯首次把唯物史观运用于研究分析比较久远的一段历史，他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教育人民群众从自己祖先英勇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力量。他用三百年前伟大农民战争中顽强而坚韧的形象来鼓舞人民群众，使他们摆脱当前的消沉状态重新振奋起来。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利用德国历史学家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中的材料证明，16 世纪德国的市民阶级同他们 19 世纪的后代即德国资产阶级一样，在革命的后期背叛了革命人民，出卖了革命，使革命最后归于失败。与此同时，他还着重指出，当时的被压迫群众由于自己阶级地位的局限而军令不统一、行动散漫，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进行战斗，也是革命失败的原因。

德国 1525 年农民革命，是在宗教改革的旗号下进行的。一些史学家据此认为，这场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神学上的争论。恩格斯指出，“16 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见本卷第 482 页)他在分析德国农民战争的同时，揭示出宗教改革同农民战争的关系，揭示出它们的社会经济原因及阶级实质。这为我们提供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剖析已往历史的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三篇《时评》和恩格斯为英国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的《民主评论》撰

写的《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两组共 12 篇文章，是对欧洲各国时局的跟踪分析报道和评论。这些文章同《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等著作的分析一样，并且以最新的材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著作中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何运用于当时面临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章中评述的当时的政治问题，不仅涉及法国和德国，而且也涉及英国、俄国、瑞士、美国，他们甚至关注着远在亚洲东部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方向。在《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中，恩格斯还提出了一些革命的基本问题。例如在《法国来信》中，他就提出了工人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他在谈到法国对农村增加赋税使农民开始觉醒时说：“在法国农业地区，社会民主派的影响已经得到惊人的广泛传播…… 社会民主派一旦把农村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不出几个月，甚至不出几个星期，红旗将会在土伊勒里宫和爱丽舍宫的上空飘扬。”而且农民阶级“终于开始懂得：只有为城镇工人谋福利的政府，才能把他们从那种虽有小块份地却越来越受痛苦和饥饿煎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见本卷第 127—128、247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一篇《时评。1850 年 5—10 月》中，对欧洲革命重新作了估计，认为欧洲革命不可能很快就爆发，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生产正开始繁荣，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正以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以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的。“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

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慨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见本卷第 596 页)关于危机和革命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等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作了进一步的、更为科学的表述。

1848—1849 年革命以后欧洲形势将如何发展,特别是有没有可能出现另一个革命高潮,这是各党各派都极为关心的问题。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代表的一批冒险主义分子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确估计,他们不顾客观现实的状况,急切盼望下一次革命很快到来。从这一点出发,他们要求同盟的全部活动以及同盟的组织建设和改造,都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开展。如果按照他们这种毫无根据而只凭主观愿望提出的计划来行动,势必使同盟过早地发动革命从而陷于孤立并导致完全的失败。这种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同盟中央大多数持正确观点的委员的反对。从 1850 年 7 月底开始,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为了同中央的多数作斗争,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同盟内部进行了反对中央的活动,而且在党外还同小资产阶级集团的首领结成宗派主义的联盟。由于维利希和沙佩尔坚持自己的错误,中央在 9 月 15 日决定将维利希和沙佩尔开除出同盟,并且决定将同盟中央迁到科隆,将自己的职权交给科隆的区部委员会。

本卷还收入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2 期和第 4 期上发表的共 6 篇书评。这些书评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背弃革命的行径作了进一步的批判。

基佐曾经是资产阶级的进步的史学家,也是最早发现阶级斗争

并认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史学家之一。他曾经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成功地剖析了英国、法国的历史事件，产生过进步的影响。但是在欧洲 1848—1849 年革命以后，他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观点，而用唯心主义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空话代替科学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基佐的《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一书时指出：“即使旧制度下最能干的人物，即使在他们那里不能不认为是史学天才的人物，也被不幸的二月事变弄得头晕目眩，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基佐先生不是通过二月革命去理解 1830 年法国君主制度和 1688 年英国君主制度之间迥然不同的历史情况、迥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位，而是用一些道德词句去抹杀它们之间的全部区别……”（见本卷第 261 页）这表明，资产阶级当时已经不再揭露社会的真相，而是力图掩盖事实、混淆视听，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中连先进的代表人物，也不再参加革命，更谈不上领导革命了。

资产阶级先进的代表人物在 1848—1849 年欧洲革命前后开始没落。这一现象并不是个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书时，也指出了这种现象，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著述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著述中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所采取的方式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见本卷第 312 页）他写的法国革命史、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和恩格斯曾经评论过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但是在《当代评论》中卡莱尔强化了自己原来就存在的英雄史观，他认为，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都可以是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真理并且按照真理去行动的贤人和贵人同与此相反的愚人和贱人之间的矛盾。结论自然就

是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卡莱尔否认“全部历史过程”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他们本身自然为一定的、本身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见本卷第318页)。这种结论的必然结果,就是为当时统治者张目,维护甚至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丑恶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两名法国警探谢努和德拉奥德的回忆文章时指出,对于职业密谋家,现有的一切描绘始终没有真实地把握住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追述了19世纪20年代以来职业密谋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些人中不少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的带着这个阶级所固有的一切放荡习性的浪荡汉。“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之作。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固定观念中那些混乱思想和偏见……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更富理论性的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见本卷第333—334页)但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秘密组织的目的已经不是直接组织起义,而是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秘密组织在30年代末就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性质。到接近二月革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无疑已经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一派,而老密谋家也不得不追随这个运动,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老密谋家的批判,同样也是针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

本卷收入了两篇恩格斯写的关于十小时工作日的文章:《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这两篇论述十小时工作日的文章表明,恩格斯认为英国当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是封建势力反

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手段。因此要工人阶级认识到，“**他们要获得任何持久的利益，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见本卷第 286 页）在当时条件下“十小时工作日法对工人来说还是必不可少的，是保护工人身体所必需的。没有十小时工作日法，英国整整一代工人的身体就要垮了。”“我们不但毫不反对，我们甚至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一天，为了不让妇女和儿童劳动过度，将采取远比十小时工作日法，甚至比八小时工作日法更严格得多的措施。”（见本卷第 307、286 页）后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 1 卷中，对十小时工作日法的意义作了更全面的评价。

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中，马克思又重新投入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恩格斯则利用一部分时间钻研他深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本卷发表的《反思》一文，反映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初步成果之一。《反思》是他 1848—1849 年革命后在伦敦写的经济学笔记（即通常所说的《伦敦笔记》）中反映部分研究成果的一篇文章。当时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金银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特殊地位，而消除危机的办法就在于银行改革。针对这种理论，马克思试图从生产领域去探索危机的根源。《反思》包含有未来的再生产理论的重要论点，这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发展成完整的再生产理论。

本卷收入的《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是恩格斯研究军事的成就之一。恩格斯这篇不是为发表只是为自己练习并同马克思交换看法而写的军事著作，是他研究工作的一个重大成就。他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科学的研究方面，首次揭示出“每个在战史上因为采用新的战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统帅，不是亲自发明了

新的物质手段,就是首先发现正确地运用在他以前所发明的物质手段的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新的生产力同样是作战方法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见本卷第 666、663 页),他还强调了战术的运用同士兵的一定的文化水平的关系。

本卷收入的文献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7 卷以及第 44 卷属于这一时间段的一部分文献。本卷新收入的文献有 8 篇,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5 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盈利和发行量的估价单》、《为再次发表路易·梅纳尔〈Jambes〉一诗加的按语》、《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为转载〈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加的附注》和《卡尔·马克思文集》;附录 3 篇:《关于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2 月 25 日举行的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两周年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的报道》、《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 年 9 月 9 日收据》和《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 年 9 月 20 日收据》。根据本全集的编辑原则,有些证件和私人信件,将分别收入性质相应的以后的卷次。此外,恩格斯和马克思于 1850 年 6 月分别写给《新德意志报》编辑的信,在本卷中合并编为一篇。有的著作属于手稿,原文没有分段,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参考其他语种的译文划分了一些段落。本卷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0 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部分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德文版第 7 卷。本卷还新收入了一封马克思《致〈纽约州报〉编辑部》的信,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0 卷出版以后新发现的文献,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发表的原文译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